



《妙法蓮華經》卷1 卷首佛說法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漢藏交融

永宣時期明廷佛教信仰的文物特色

劉國威

一般人較為認識蒙元與滿清時期的帝王皆信仰藏傳佛教，因此留下不少與藏傳佛教相關的內廷文物。而明王朝對佛教的態度則較不一致，有接納者，也有排斥者，明初永樂與宣德兩位皇帝則可說是虔信藏傳密教的代表性人物。過去對此時期曾有過的漢藏文化密集交流較為忽視，也曾認為多是出於懷柔遠人的政治目的，近年研究較理解到此時期帝王內心的宗教信仰及其相關作為，本文即以此角度略探永宣時期的漢藏佛教文物特色。

北宋和西藏未曾直接往來，所以宋人對十一世紀初逐漸復興的藏傳佛教文化幾無所知。至十二、十三世紀期間，西夏人基於佛教信仰，同時引入漢傳佛教（以禪宗與華嚴宗為主）與藏傳佛教（以噶舉派與薩

迦派為主），使得漢藏佛教自唐代敦煌後有再度互動的機會，但其影響仍僅限西夏統領的西北地區。當西夏於一二二七年為成吉思汗所滅，其文化雖漸淹沒流失，卻間接影響蒙人接受藏傳佛教為其主要信仰；透過蒙元王

朝，漢藏佛教在漢文化地區方出現真正往來。在當時西藏教派已漸成形的情形下，蒙古人扶植薩迦派成為西藏的掌政教派，於大都設立總制院，委由薩迦派僧人所任帝師管理西藏行政暨漢藏佛教事務。當時，西藏受元朝

的封授及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管理，來自蒙古的影響亦旁及宗教文化層面，如：藏人雖自吐蕃時期即自漢地習得如何造紙，然尚無力刊印典籍，由於蒙古貴族對藏傳佛教的佈施，藏文佛典——即西藏後世所稱的「蒙古版」(hor par ma)——的刊刻流通，使得獲促進。彼時藏區一些重要佛寺亦邀請不少漢地工匠參與修建，如薩迦寺、夏魯寺等，其建築、雕刻因而融匯了漢地藝術風格。

藏傳佛教於內地的傳播，在元明清三代一直遭到儒士階層的反對；依儒家價值觀所撰之正史對藏傳佛教自然不會有正面評述。漢傳佛教僧人對藏傳佛教的態度也不盡一致，有傾心隨學者，有平等對待者，也有藐視攻擊者。各朝帝王的態度也各不相同，元清兩朝幾乎所有帝王均虔信藏傳佛教，而明代帝王則表現出不一致的態度，有虔信者（永樂、宣德、成化、正德）、也有排斥者（正統、弘治、嘉靖），其中永樂與宣德二帝即是虔信代表，使漢藏佛教文化於十五世紀初產生新一波的文化交流。（註一）

「大國師」或「灌頂國師」，人數也不過四五人而已。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他對各教派藏僧的敕封就不僅僅是懷柔遠人，而含有更深層的內在信仰。《明史》也指出永樂帝對藏傳佛教是「兼崇其教」的。過去學者曾認為明成祖推崇藏傳佛教主要基於政治考量，近年研究已證明永樂皇帝朱棣對藏傳佛教的接觸與認識實淵源自其早年身為燕王時長駐北京，深受其所處元大都環境及周遭所統領原蒙古族軍臣影響，對藏傳佛教早非陌生。（註二）他對藏區當時政教合一特色的各教派狀況，以及藏民「惟僧言是聽」的傳統，有較其先輩更全面的認識。元末，噶瑪噶舉派領袖三世與第四世噶瑪巴曾先後受元順帝邀請入京弘法，與元皇室結下因緣。藉此我們即可理解，為何成祖即位後，不請其他漢傳僧人，卻派遣漢僧智光（一三四八—一四三五，印僧薩哈撈釋哩 Sahajastri 弟子，通梵藏文）與宦官侯顯（出身河西地區的藏人）遠赴藏地邀請第五世噶瑪巴 (de bzhin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對儒釋道三家基本上採取調和策略。以儒教為國教，使其成為國家組織與意識形態的核心，並以科舉制度保證其地位，復將佛道置於輔佐地位，支持佛教發展。舉例而言：如朱元璋曾組織刊刻大藏經（《洪武北藏》），詔天下沙門廣泛宣講《般若心經》、《金剛經》、《楞伽經》三部大乘經典，命季潭宗泐、太璞如玘（註三）、竺隱弘道等高僧註解闡述三經（後收入《永樂北藏》），又詔宗泐率三十餘僧人遠赴西域，搜求佛經，以補聖典遺佚。

另一方面，他又對宗教加以嚴密控管，欲將佛道二教納入王權統治，因此對佛教採取一系列管理措施。如設置佛教管理部門：洪武初年（一三六八）設善世院，後又設立僧錄司，各級地方政府也分別設立下級佛教事務管理部門；將天下（漢傳）寺院分為禪、講、教三類，僧人也依是分之，規定「禪者禪，講者講，瑜伽者瑜伽」（《明》大聞幻輪《釋鑿稽古略續集》卷一，《大正藏》第四九

冊）亦即禪寺住禪僧，講寺住講僧，教寺住教僧（瑜伽僧），不得混濫；同時建立嚴密僧籍、度牒以及考核制度，並限制佛教信徒人數，規範佛教信仰行為，嚴格區分僧俗界限，如《明史》所記：「（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清理釋、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給牒。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者一所，並居之。凡僧道，府不得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試給牒，不通經者黜之。」

這些嚴謹規範與限制，一般認為是明清時期佛教漸衰的主因之一。然而，這些措施主要在限制漢傳佛教，明太祖對藏傳佛教完全是另一態度與手段。朱元璋以「來者輒授官」等策略招徠藏族僧俗首領，《明史》記載：「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唯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乃遣使招諭。」（卷三三〇，〈西域二·西番諸衛〉）雖然招攬，但明太祖對藏僧所賜封號，最高僅為

stegs pa, 一三八四—一四一五）至南京靈谷寺為其父母舉行超薦法會，其目的非僅為「化愚俗，弭邊患」（卷

三三二，〈西域三〉）而有其歷史背景與信仰動機。他一改其父所立制度，也不採用元代「帝師」體制，在短短約十年（一四〇五—一四一五）間，先後敕封帕竹噶舉領袖為闡化王（一四〇五）、貢覺地區灌頂國師為護教王（一四〇六）、靈藏地區灌頂國師為贊善王（一四〇六）、第五世噶瑪巴為大寶法王（一四〇七）、直貢噶舉派領袖為闡教王（一四一三）、薩迦派領袖昆澤思巴 (Kun dga' bkra shis, 一三四九—一四二五) 為大乘法王（一四一三年成祖邀請南京，一四一五受封），薩迦派達倉地區領袖為輔教王（一四一五），以及「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至於其他禪師、法師，則「不可悉數」（卷三三一，〈西域三〉），形成明代專對藏僧所冊封自法王、教王、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禪師等品級明晰的制度。

明初內府藏傳佛教造像

洪武時期，規定西藏各派三年一貢，西藏貢品多是地方特產或是藏區馬匹等；洪武六年，藏區帕竹王朝領袖章陽沙加監藏（元末取代薩迦王朝的帕竹噶舉所建王朝第二任第司 (sde stod) 領袖）「遣酋長鎖南藏卜以佛象、佛書、舍利來貢」（《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七八）這是藏區向明廷進貢佛像的最早紀錄，而明廷的回禮多是官印、詔書、絲織品、茶葉，加上黃金、白銀、鈔幣等，尚未見回贈漢地佛教文物的記載。到永樂時期，藏區各派領袖已不再沿襲洪武時期所定三年一貢的傳統（註四），不僅頻繁，且人數眾多（有的是單一教派，有的是數派聯合），此時明廷的回贈開始包含佛教文物，如佛經、佛像、唐卡、法器、乃至瓷器等。為因應當時大量的佛像賜贈，成祖仿效元朝在內廷成立專門的造像機構。

漢文史料對永宣時期的藏地佛像賞賜有相當多的記載，舉例而言，明廷與大寶法王間有三次佛像賞賜：永樂四年一次佛像進貢，永樂六年

與十一年兩次佛像回賜。《明史》雖載明廷對薩迦派大乘法王的賞賜是「禮亞於大寶法王」，但其實雙方的互相貢賜更多：大乘法王曾兩次進京進貢，永樂帝則四次回贈佛像。成祖曾兩次邀請格魯派初祖宗喀巴（一三五七～一四一九）進京，宗喀巴以年邁婉拒，改派其弟子釋迦也失（Shakya ye shes, 一三五四～一四三九）為代表，師徒三次進貢，永樂帝則兩次回贈佛像。其餘各派進貢與回贈佛教文物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如此往來貢賜的傳統至宣德時期更為興盛。現今在藏區古寺、或各地博物館典藏、或私人蒐藏中，確定為明內府所造藏傳銅佛像約三百餘尊，僅見「大明永樂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兩類款識（以布達拉宮現存所藏為例，永樂時期銅佛三十九尊，宣德時期銅佛三尊），應與永宣時期漢藏間密切往來賜贈有關。

西藏唐卡本以布畫為主，風格原本較受喀什米爾與尼泊尔的印度佛教美學影響；永宣時期對西藏的賜

贈亦包含許多內廷所造畫像，這也對藏傳繪畫帶來新一波影響。以現存可見的有限畫像為例，有些是以漢地刺繡工藝所造藏式本尊圖像，如大昭寺所藏具「大明永樂年施」題款的「大威德金剛」與「勝樂金剛」繡製唐卡，或是二〇一四年佳士得拍賣的永樂年題款「紅色閻摩敵」等。繡製唐卡雖已見於元代，但那時主要仍為印藏風格，明代始見融合漢風。另一類則是直接以漢地技巧繪製的圖像，以祖師人物為主，如原藏噶瑪噶舉派祖普寺，長達十五公尺的明〈大寶法王建普度大齋長卷〉。此幅由四十九組畫面組成的長卷描繪的是第五世噶瑪巴在南京靈谷寺為明太祖及皇后建普度大齋的場景，這是永樂帝賞賜大寶法王的回贈之一（現藏拉薩西藏博物館）。西藏乃寧寺藏釋迦立像絹畫一軸，像左側漢文金字書《大明皇帝御制栴檀佛像贊》，右側金字書該贊文藏譯，末行年月記為「永樂十年四月十七日」；西藏的釋尊造像一般為坐像，立像為漢地傳統。色拉寺

所藏宣宗勅贈釋迦也失（宣德九年（一四三四）受封為大慈法王）的緯絲唐卡「大慈法王像」，也同具明顯漢式人物風格。西藏唐卡兩大畫派的創始人曼拉敦珠（*snan bla don grub*）與欽哲旺秋（*mkhyen brise dbang phyug*）均活躍於十五世紀後半期，其共通特色是在唐卡所繪主尊背景中融合不同程度的漢地風格與技巧。曼拉敦珠的傳記更記載他自認其前世曾為漢地畫師，因而喜好並擅長漢地畫風，這都顯示明代漢藏交流對藏區藝術的影響。

永宣時期內廷佛典

永樂帝在內府成立「漢經廠」與「番經廠」，專門進行漢藏文佛經的抄寫與勘刻。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甘珠爾》即由成祖下令勘刻於南京，現稱「永樂版」（成於一四一〇年），成祖親作《藏經贊》刊以篇首：「聯撫臨大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緒之德，幼勞英報，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

梓印施以資為薦揚之典。」永樂年間也先後兩次編纂漢文大藏經《永樂南藏》（一四一二～一四一七）與《永樂北藏》（一四二一～一四四〇），其中均收有《番字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此經全為藏文，這也是藏文佛典在內地刻印流通的旁證。

觀音菩薩的心咒「唵嘛呢叭吽吽」（*om manipadme hum*）自古至今一直是藏人持誦的最流行咒語，此「六字大明」咒（*sadaksari mahāvīdyā*）源自《大乘莊嚴寶王經》（*Karandavyūha-sūtra*），其漢譯本早於北宋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即由印僧天息災譯出，經中將之音譯為「唵麼呢鉢訥銘（二合）吽」。此經咒在北宋以來的漢傳佛教領域幾無影響；元代因蒙人信仰藏傳佛教，雖已流傳，尚未在內地佛教通行。直到明成祖邀請第五世噶瑪巴至南京弘法，因噶瑪巴的提倡，方漸流行。歷代噶瑪巴皆極推崇此六字真言，第二世噶瑪巴（*Karma Pakshi*, 一二〇四～一二八三）甚且被稱為「瑪尼巴」

（即持誦六字真言者）；第五世噶瑪巴弘揚此咒，自在情理之中。在永樂皇帝的刻意推行下，此咒以「唵嘛呢叭吽（或是囉字）吽」的音譯形式大弘於明代。永樂時期內府刊寫的多部佛經均收錄此咒：如永樂親序的《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永樂十五年成祖御撰而由內府刊印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與《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以及院藏永樂年間的《大乘經咒》寫本等。北京大鐘寺古鐘博物館所典藏「永樂大鐘」，鐘面鑄寫許多梵漢佛教經咒，其中亦含《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和蘭札體梵文「六字大明」咒。

明人徐學聚《國朝典匯》載：「遣使往天竺，迎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吽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明代官方史料自永樂起常將西藏與印度混用，將烏斯藏稱為「天竺」、「西天」、或「小西天」。這並非出自無知的混淆；永

樂時期對世界地理已有相當清楚的認知，如此刻意混稱是來自當時藏傳佛教的信仰背景，因佛法在印度已滅，西藏取代印度成為佛法的「西天」所在。明代文人不知其內意，以致常沿襲誤用，如明人田藝衡的《留青日札摘抄》中有：「烏斯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慎懋賞所著《四夷廣記》中將永樂迎大寶法王之事誤列於榜葛刺（今孟加拉）段落，以致季羨林先生據此認為六字真言可能源於孟加拉。（見《季羨林文集》第十四冊）

明宣德六年刻印的《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彙集部分大乘經典和諸佛菩薩的畫像，其中部分咒語是漢文、蘭札體梵文、藏文、蒙文四體合璧，此部著作也與噶瑪巴有關。（二〇一一年中國藏學出版社曾翻印）該書第二卷漢文跋云：「聖皇恩重，父母情深，欲報之德，昊天周極，謹發誠心，繪畫西來大寶法王所傳諸佛世尊妙相番相，並書寫諸品經咒，刊板印施，流傳持誦，…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吉日謹施。」大寶法王即指第五世噶



圖2 《妙法蓮華經》卷1 卷首佛說法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海》的漢譯本很可能就是本院所藏明英宗正統四年（一四三九）泥金寫本的《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註

此次舊金山借展的兩部佛經
北京故宮羅文華研究員曾對明代泥金寫經中釋迦牟尼佛像身著袈裟上的花朵紋飾如何自藏區傳至漢地做了非常詳盡的分析：十四世紀以前，藏區釋迦牟尼佛像袈裟上開始出現花朵

六個人認為，院藏另一孤本——宣德三年（一四二八）的《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亦與其有關。該經內容雖是大理阿吒力教，但其內許多元素又明顯源自藏傳佛教。由於明廷內最受崇奉，且能向宣宗傳授密法灌頂的就是班丹札釋，此經卷首的藏傳上師像可能就是其畫像。明景泰年間，班丹札釋受封為大智法王：《秘殿珠林》記載，本院院藏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完成的《龍藏經》，其製作因緣是清宮原藏「明景泰年造鑲嵌珠寶磁青箋泥金書西域字龍藏經一部」，年久破損，所以孝莊太皇太后下令重造，這部景泰年間所造《龍藏經》看來也應與大智法王班丹札釋有關。

紋，但僅是局部裝飾，或僅見於內袈裟；到十四世紀下半葉，即洪武年間起，漢地刊印的佛經插圖中已出現同樣裝飾圖案；到永樂時期，此類於佛袈裟上的花朵紋飾已在漢藏兩地蔚為風氣。（註七）羅文華先生對該特徵的觀察是非常準確的，基本上本院所藏明內府刊寫佛經大都具此特點。

此次赴舊金山所展的兩部佛經——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妙法蓮華經》泥金寫本與宣德七年（一四三二）的《普門品》和《般若心經》合抄泥金寫本，其開首佛說法圖的佛陀造像雖未全符合此特點，但有一部分可印證這兩部漢譯佛典寫本中的西藏元素。（圖二）

《妙法蓮華經》七卷七冊，經摺裝，再盛一木匣。卷首佛說法圖中佛陀袈裟未具花朵紋飾，較似元「磧砂藏」佛說法圖的漢藏混合風格，但圖中諸尊臉孔及外露身軀均以泥金塗飾，髮以靛藍表示，較少見於其他佛經寫本。卷一尾題有朱書藏文「ka ni」一字：卷二至卷七正文卷端均題有朱書



圖1 宣德6年 《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 噶瑪巴大寶法王及其六字真言心咒引自2011年中國藏學出版社翻印本

瑪巴，該書也收有大寶法王畫像，畫像下四體文題記中有「心咒」六字真言（圖一），這也印證前引文獻記載噶瑪巴教人念誦六字真言的記述。

青海省樂都縣境內的瞿曇寺，是明代湟水流域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該寺自創建起，一直得到明初數代皇帝的重視，地位凸顯，要謂之皇家寺院亦不為過。瞿曇寺最具代表性的三座殿堂瞿曇寺殿（建於洪武

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寶光殿（建於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和隆國殿（建於宣德二年，一四二七），是在太祖、成祖、宣宗的支持下完成的。近年在維修瞿曇寺時發現了明版藏文《大乘莊嚴寶王經》，前有明宣宗所作漢文〈御制大乘莊嚴寶王經序〉。從序文可知，宣宗因平日閱讀此經，認為其具許多功德，命人譯為藏文；宣宗不明此經早有漢譯，才有

命人翻譯之舉。瞿曇寺所藏此藏文本《大乘莊嚴寶王經》跋文注明該經由班丹札釋（dpal ldan bkra shis）校勘，可見他並未自漢重譯，而是根據藏譯本和漢譯本間進行對勘修訂。

這位班丹札釋出身岷州，兼習薩迦派和噶舉派，「芳譽四馳，達于朝野」，成祖獲徵至南京，「館留京寺，對揚稱旨」，「授以僧錄闡教」，可說是宣宗時內廷最得皇帝崇信的藏僧，宣宗不僅加封「淨覺慈濟大國師」，後更賜號「西天佛子大國師」。（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札釋畫像記），載《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一冊 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mdo smad chos 'byung）記載：「宣德元年，火馬年，封淨覺慈濟大國師稱號，賜象鈕金印重二百兩，令居大崇國寺。奉皇帝令，造《喜金剛甘露海》、大輪、金剛怖畏、普明、無量壽九佛之壇場儀軌、《多聞天修習儀軌》、《中陰引介》等，並將它們和《喜金剛本續后分注疏》一起譯為漢文。」（註五）沈衛榮教授從多項證據推測班丹札釋所造這部《喜金剛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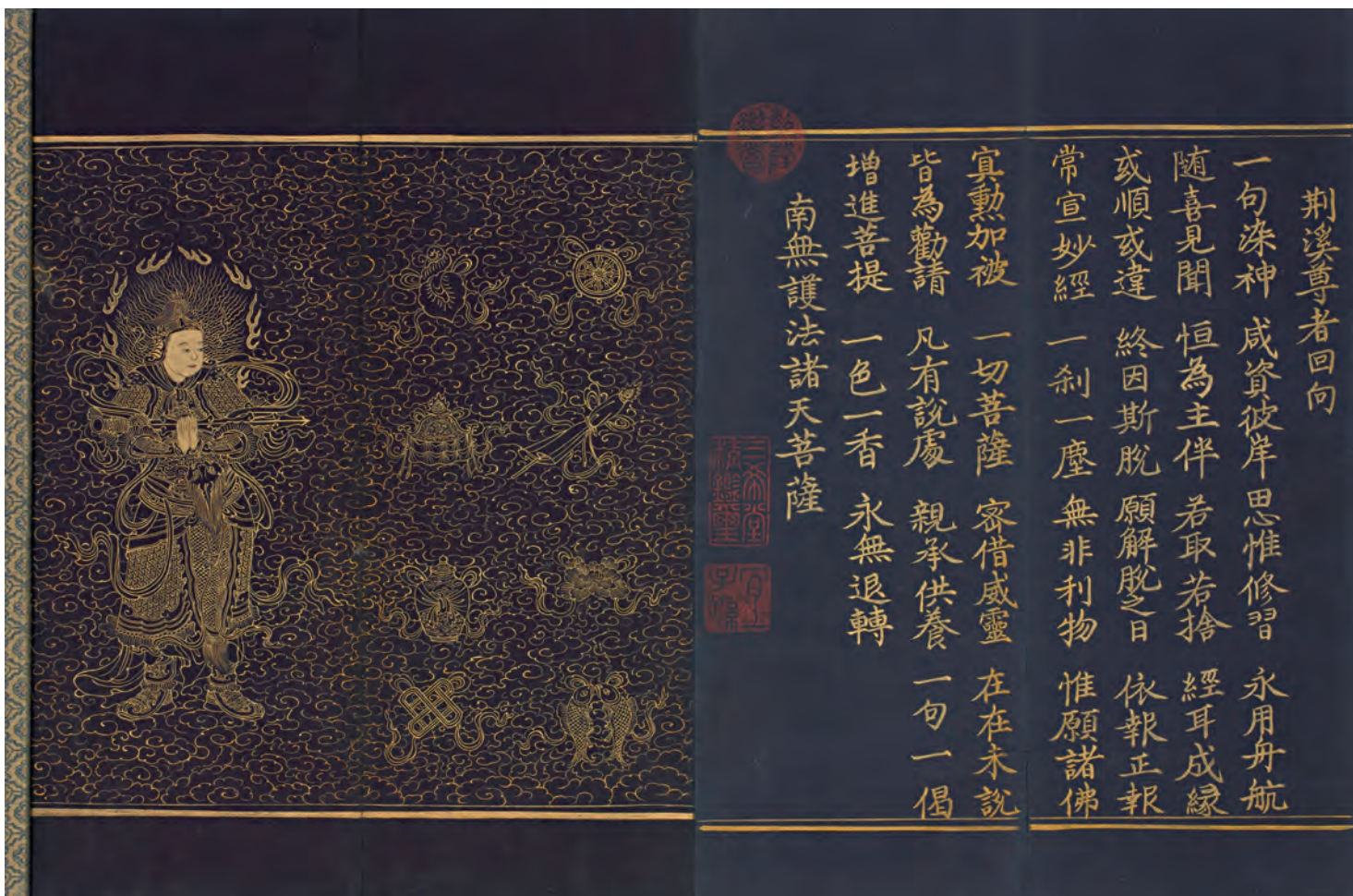


圖5 韋馱天與八吉祥 《妙法蓮華經》卷7 拖尾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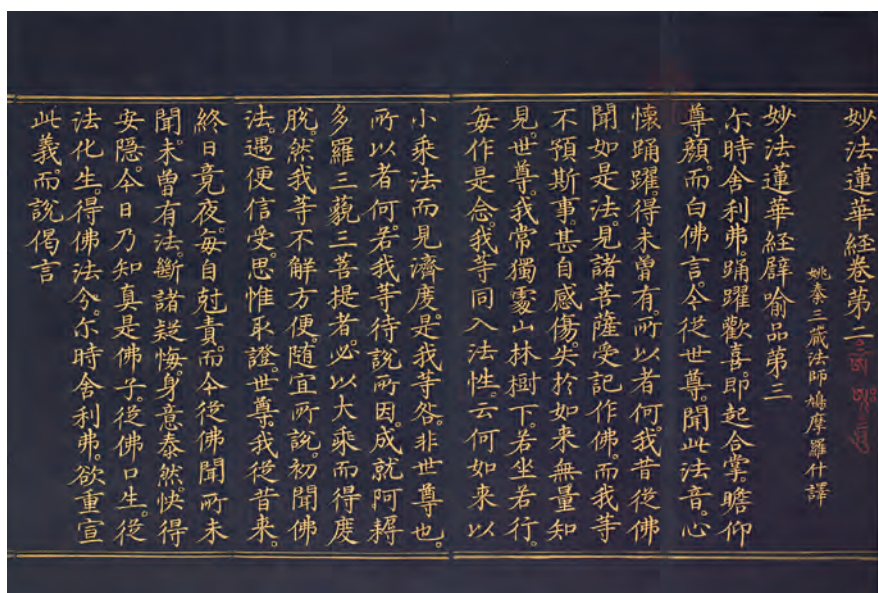


圖3 《妙法蓮華經》卷2 首頁朱書藏文俺、阿、吽三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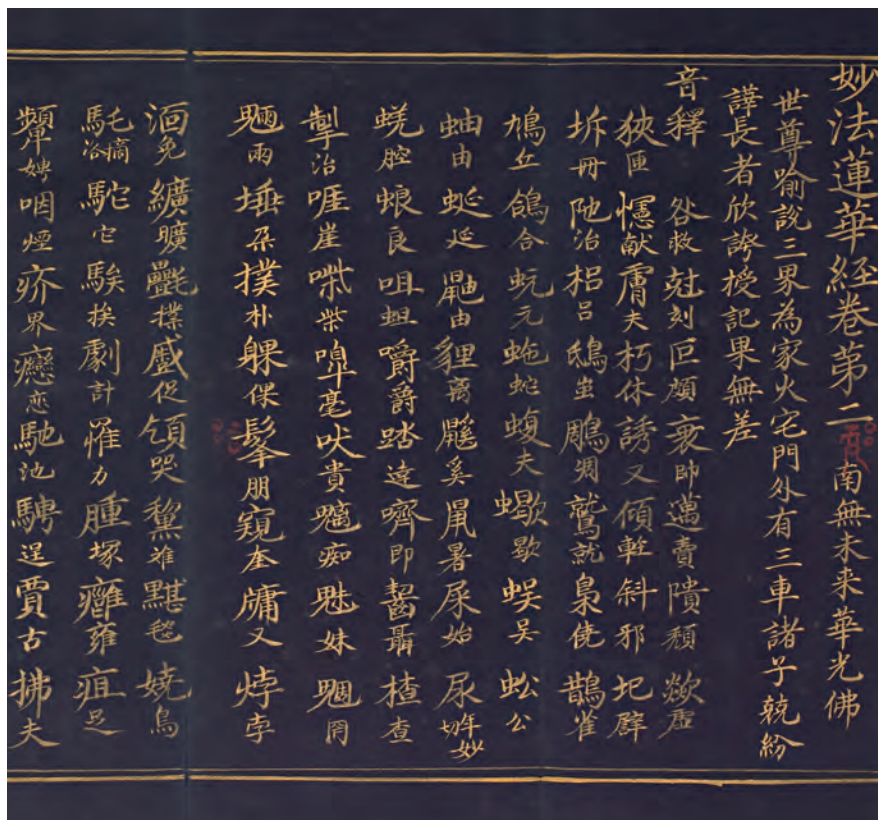


圖4 《妙法蓮華經》卷2 尾朱書藏文rkṣah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藏文(om、ah、hūm)三字(圖三)、尾題下則亦有朱書藏文rkṣah。(圖四)卷七末尾有漢式韋馱將軍與藏式八吉祥圖飾(圖五)，此八吉祥圖與院藏

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末頁八吉祥圖飾的畫法與排列明顯不同，較似元代漢地流行的八吉祥圖飾。

俺、阿、吽三字表加持義，在許多經典內曾出現，西藏唐卡背面也常書寫此三字以表開光加持。經書上寫rkṣah則較少見，此字亦源自梵文，

荆溪尊者回向
 一句殊神 咸資彼岸 思惟修習 永用舟航
 隨喜見聞 恒為主伴 若取若捨 經耳成緣
 或順或違 終因斯脫 願解脫之日 依報正報
 常宣妙經 一刹一塵 無非利物 惟願諸佛
 真勲加被 一切菩薩 密借威靈 在在未說
 皆為勸請 凡有說處 親承供養 一句一偈
 增進菩提 一色一香 永無退轉
 南無護法諸天菩薩

指北斗七星或二十八宿，代表獲星曜庇佑。唐宋時期來自印度密教信仰的影響，認為九曜能致禍患，持誦熾盛光佛咒能攘除相關的災星惡曜，所以熾盛光佛的信仰甚為流行。本院典藏另一部明代的《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泥金寫本，內含一蘭札體梵字書寫製作的熾盛光佛咒輪，未曾見於其餘明版，明顯源自藏傳佛教傳統。此外，院藏永樂時期的《大乘經咒》泥金寫本卷四亦收此「大威德熾盛光如來消災吉祥陀羅尼」，顯示熾盛光佛信仰在明代仍受重視。rkṣah另一可能是試圖拼寫梵文rkṣa一詞，義為「護佑」。

宣德七年(一四三二)的《普門品》和《般若心經》合抄本，其卷首佛說法圖釋尊像袈裟具花朵紋飾特點，卷內以泥金繪製四十二幅插畫，主要描繪觀音菩薩以種種應化身示現眾生遠離各種災難，主要是漢地風格，但亦見部分漢藏混合特點，如其中的「饒益生男生女觀音」像，具部分永宣時期內府藏式銅菩薩像樣貌——髮梢在兩耳際和頸後打成一道弧形，



應以毘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毘沙門身而為說法



圖7 毘沙門天身像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僅現於造像、繪畫、經籍，文物工藝亦可見其例。藏文典籍中對明代皇帝頒賜噶瑪巴的部分獨特文物有其專屬名稱，其最著名者就是「噶瑪漢碗」(Karma gan dkar)。宣德九年(一四三四)成書的《漢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作者達倉巴覺桑波(stag tshang dpal 'byor bzang po)曾以頌文描述：「後由朝廷頒賜碗有二，化身國王大明皇帝贈，名為「星」(skar)碗予德新謝巴(第五世噶瑪巴)，及眾生怙主大乘法王。碗有大小，大碗屬大乘(法王)，青花上有「白晝吉祥」辭，具六圖飾及八吉祥等，甚為稀奇圖案顯為佳，具此二特點流行於當今。」(Dpal 'byor bzang po.《漢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 藏文版)，頁三三三)

如其所述，上有藏文吉祥祈願文(bkra shis tshigs bcad)「晝也吉祥夜吉祥，一切時中願吉祥，晝夜恆常吉祥者，惟願三寶降吉祥」(nyin mo bde legs mshan bde legs/ nyi ma' i gong la bde legs shing/ nyin mshan rtag tu bde

leags pa/ dkon mchog gsum kxis deng 'drisoi)的明青花瓷器確實不少。在藏區，上有「宣德年製」註記的青花瓷碗(dkar yol sngo khra)在薩迦寺與羅布林卡等古寺典藏中仍可見，藏人傳統上對類似風格的明清時期舊碗通稱為「噶瑪漢碗」，意指透過噶瑪巴自漢地傳入的碗式。

「噶瑪漢鈴」(Karma gan dri)則是指明代皇帝賜贈噶瑪巴而傳入藏區的鈴杵法器，也稱「漢式鈴」(rgya nag dri bu)。十八世紀寧瑪派著名行者吉美林巴(jigs med gling pa, 一七二九/三〇~一七九八)所著《鑿寶之語》(rin po che brtag pa'i gtan)中記載：「漢大明皇帝時期製作的鈴有三種，(上品)鑄造乾淨、光滑、鮮亮，器口向下厚實，黑色，畫紋極為填密，聲音悅耳，大小比藏區的舊鈴略大一些，分有鈴端金剛(柄)鍍金、鈴身銅鍍金、以及銅不鍍金等多種樣式。大明漢式銅鈴普通款則鑄造不甚純淨，形狀端直，音清亮。所有鈴皆有函套，上用印度蘭札



觀世音菩薩有如是力若有眾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

圖6 饒益生男生女觀音像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耳際各分出一條髮辮垂搭於肩，兩耳邊各有一U形翻卷繪帶(圖六)；「毘沙門天身」像手持之佛塔，為藏式覆钵佛塔。(圖七)

明僧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記述一位歷洪武至宣德朝的著名高僧慧進(一三五五~一四三六)：早年他受永樂之命於南京靈谷寺編纂《大明三藏法數》，後於北京負責刊印《永樂北藏》。永樂皇帝曾應其所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永樂後亦敕贈慧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並陞其為左闡教；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據此紀錄，院藏宣德元年的《金剛經》泥金寫本、宣德五年的《大寶積經》與《大涅槃經》泥金寫本可能都與此位華嚴宗高僧有關。

「噶瑪漢碗」與「噶瑪漢鈴」

永宣時期漢藏藝術的交流不僅



圖8 「大明永樂年施」鈴杵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宮藏傳佛教文物》，頁207



圖9 六世班禪進貢之〈宣德鈴杵〉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宮藏傳佛教文物》，頁208

噶瑪漢鈴，屬布達拉宮之內供。」此鈴確與永宣時期銅鈴有些許差異：鈴柄未鍍金，柄尾亦未有寶瓶雕飾；鈴面非獸面瓔珞，而是蓮花瓔珞。此外，鈴面八種子字為藏文，非蘭札體梵文。藏區後來仿造此類「噶瑪漢鈴」重新製作，但將蘭札體梵字改為藏文字母，此為重要判定分別。

十七世紀一位名為sngags 'chang hñm ka ra dza ya所作鑑別西藏文物的典籍《辨別方法—白蓮花束》(brtag thabs padma dkar po'i chun po)記載金剛鈴杵可分蒙式、藏式、漢式三類，其中說到漢式又名為「噶瑪漢鈴」，分為「特等鈴」(khyad dril)與「一般鈴」(phal dril)兩類；又可分為二種：「色拉漢鈴」(se ra gan dril)，較「噶瑪漢鈴」小；「噶丹漢鈴」(dga' ldan gan dril)，其鈴端較緊。(註十)因此，永宣時期內府所造鈴杵透過賜贈而影響藏區，形成一專屬「漢式」類別，院藏此副鈴杵當為格魯派依此風格再造之法器。

結論

體梵字書五方佛種子字。」(註八)

北京故宮、拉薩西藏博物館，以及布達拉宮各藏有一副帶有「大明永樂年施」款的銅鈴杵，其共同特徵都符合吉美林巴的描述：具函套、鈴柄鍍金、鈴面覆蓮瓣紋上分別有八個蘭札體梵文種子字。(圖八)此外，鈴身側面的獸面(krimukha)與瓔珞紋是另一特徵。帶宣德款識的銅鈴杵亦存三副，分存西藏博物館、北京故宮、中國歷史博物館，造型裝飾均與永樂鈴杵相仿；北京故宮所存〈宣德鈴杵〉，則是由六世班禪再度貢奉予清廷。(圖九)

銅鈴上八梵文種子字依序為 tam, bam, lam, mam, cum, bhrum, pam, man，分別是八位女性本尊的代表種子：度母(Tara, 東)、持世菩薩(Vasudhara, 東南)、白衣佛母(Pandaravasini, 南)、準提菩薩(Cunda, 西南)，以及瑪麻吉佛母(Mamaki, 西)、毘俱胝菩薩(Bhrikuti, 西北)、佛眼佛母(Locani, 北)、鬘母(Mala, 東北)。這八位本尊源自《喜金剛本

續》(Hevajra-tantra)的釋續《和合續》(Sampūta-tantra)。史載薩迦派大乘法王於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二月在南京晉見永樂，曾傳授永樂皇帝喜金剛與大黑天(Mahakala)的灌頂；成祖後於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四月十七日為內地雕印的《喜金剛本續》親自作序。依此淵源看來，此類鈴杵在永樂時期的製作背景可能與薩迦派有關。

本院典藏一副清代自藏區貢奉的鈴杵，其盛裝皮盒內有墨書四體文字，其漢字為：「布達拉廟內密藏供奉，尊聖喇嘛根敦札木素、達賴喇嘛索諾木札木素、及五輩達賴喇嘛等手內常執，噶爾瑪時成造之大利益鈴杵。」(註九)該紀錄意謂此鈴杵曾先後由二世(一四七五~一五四二)、三世(一五四三~一五八八)、五世(一六一七~一六八二)達賴喇嘛持用，故約為十五世紀左右文物，然漢文題記未將藏文末尾準確譯出，藏文為karma gan dril ra log byin rabs can po ta la'i nang ten gras，應譯為「乃具加持之再造

筆者透過此次借展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兩部永樂與宣德時期泥金寫本漢傳佛典，簡要論述了明初這兩位皇帝在位期間的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特色。過去多研究蒙元或滿清皇帝的藏傳佛教信仰，對明代漢人王朝內的

註釋

- 當然這在儒士眼中是不可取而試圖掩蓋的，如明內閣大臣梁儲(一四五—一五二七)對明帝尊崇藏傳佛教即試圖提出解釋：「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烏斯藏大寶法王》)。
- 如玘(一一三〇~一三八五)是天台宗僧人，他於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以泥金抄寫的《法華經》是本院院藏的明初重要寫經之一。
- 近年相關論述不少，具代表性者可參考Toh, Hoong-teh (卓鴻澤) Tibetan Buddhism in Ming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 永樂十八年後甚至是一年一貢。明代中期以後因為對藏僧來朝的賞賜負擔越顯沉重，所以多次重申要維持弘武朝的三年一貢制度，甚至是「國師以下不許入貢」。
- 貢卸多巴饒吉 (brag dgon zhabs drung chog mchog bstan pa rab rgyas) 著，《政教教史》(yul mdo smad ki ljongs su thub bstan rin po che ji ltr dar po'i tshul gsal bar brijod po deb ther rgya mtsho)，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一，頁八八—。
- 沈衛榮、安海燕，〈明代漢譯藏傳佛教文獻和西域僧團—兼談漢藏佛教史研究的語文學方法〉，收於《清華大學學報》第一期，二〇一一年，頁八一—九三。
- 羅文華，〈明人書內府金藏經考—兼論十四、十五世紀漢藏繪畫風格的要素〉，《藏學學刊》第一輯，成都：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頁一九三—二〇一。
- Jigs med gling pa mkhyen brtse 'od zer, "In po che brag po'i gñam tsinta ma Ni'i mdzod khang" in gñam gyi tshogs theg po'i rgya mtsho. 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一一三—一六二。
- 蔡汝芬，〈皇權與佛法—藏傳佛教法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九，頁七六。此副鈴杵在本院五月開始的「噶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特展」中展出，亦可參見其圖錄。
- Sngags 'chang hñm ka ra dza ya, brtag thabs padma dkar po'i chun po. Dolonji: Tashi doñil, 1979.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